



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

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

媒介的转型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Media

全球化、道德和伦理

[英] 尼克·史蒂文森 (Nick Stevenson) 著

顾宜凡 等 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媒介的转型

——全球化、道德和伦理

〔英〕尼克·史蒂文森 著
顾宜凡 等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01-2005-028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英)史蒂文森(Stevenson, N.)著;顾宜凡等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

(未名译库·当代西方学术前沿丛书)

ISBN 7-301-11038-3

I. 媒… II. ①史… ②顾… III. 传播媒介-研究 IV. G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04612号

书 名: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

著作责任者:[英]尼克·史蒂文森 著 顾宜凡 等译

责任编辑:曾理 赵晨

标准书号:ISBN 7-301-11038-3/G·1945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pup.cn>

电 话: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011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pw@pup.pku.edu.cn

印 刷 者: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 销 者:新华书店

890毫米×1240毫米 A5 8.375印张 200千字

2006年10月第1版 2006年10月第1次印刷

定 价:22.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未名译库》出版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二三十年代，当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及万有文库中的许多译者来自北大。百年来,在北大任教过的严复、林纾、蔡元培、鲁迅、周作人、杨昌济、林语堂、梁实秋、梁宗岱、朱光潜、冯至、曹靖华、金克木、马坚、贺麟、洪谦、宗白华、周一良、齐思和、唐钺、刘振赢、赵萝蕤、杨周翰、郭麟阁、闻家驊、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高名凯、王力、袁家骅、岑麒祥等老一辈学者,以及仍在北大任教的季羨林、杨业治、魏荒弩、周辅成、许渊冲、颜保、张世英、蔡鸿滨、厉以宁、朱龙华、张玉书、范大灿、王式仁、陶洁、顾蕴璞、罗稜、赵振江、赵德明、杜小真、申丹等老中青三代学者,在文学、哲学、历史、语言、心理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领域里,以扎实的外语功力、丰厚的学识、精彩的文笔译介出了一部又一部外国学术文化名著,许多译作已成为传世经典。在他们的译作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对振兴中华民族的责任和对科学文化的关怀,为我们的民族不断地了解和吸收外国的先进文化架起了一座又一座的桥梁。

值此北大出版社建立 100 周年之际,我社决定推出大型丛书“未名译库”(Weiming Translation Library)。“译库”为大型的综合性文库。文库以学科门类系列及译丛两种形式出版。学科门类系列包括:哲学与宗教系列、文学与艺术系列、语言与文字系列、历史与考古系列、社会学与人类学系列、传播与文化系列、政治学与国际关系系列、经济与管理系列等;译丛为主题性质的译作,较为灵活,我社即将推出的有“经济伦理学译丛”、“新叙事学理论译丛”、“心理学译丛”等等。“未名译库”为开放性文库。未名湖是北大秀丽风光的一个象征,同时也代表了北大“包容百川”的宽广胸襟。本丛书取名为“未名译库”,旨在继承北大五四以来“兼容并包”的学术文化传统。我们将在译库书目的选择(从古典到当下)和译者的遴选上(不分校内校外)体现这样一种传统。我们确信,

只有将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我们的头脑,才能够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我们将长期坚持引进外国先进的文化成果,组织翻译出版,为广大人民服务,为我国现代化的建设服务。

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在图书的选目与翻译上存在不少疏漏,希望海内外读书界、翻译界提出批评建议,把“未名译库”真正建成一座新世纪的“学术文化图书馆”。

《未名译库》编委会

2002年3月

序

写这本书花的时间比我最初预期的长了很多。这中间有多重原因,包括我对本书方向和侧重点的调整。最初只是想针对后现代主义的某些流派,展开道德主义角度的辩论,但最终却延伸到要求我们对不断媒介化的时代中的道德和伦理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书就像人一样,它们出来的结果很少与我们所预期的相吻合,这可能是一个大家都已经熟悉的经验了。

不过,以一本有关“远程”传播的书献给住得离我很远的朋友安东尼·艾利略和尼古拉·哲拉提,倒是挺合适的。这本书也是献给露西·詹姆斯——我的“新欢”的。我希望她能与我长相守,从而成为我的“旧爱”。

对于我要感谢的人,首先要提到的是对我来说像宝石般珍贵的我的出版商萨拉·凯诺。我还要感谢安东尼·艾利略、西昂·侯莫、先·梅克尔、约翰·威斯特伽德,特别是麦克·坎尼在本书改写的不同阶段给予我的支持。他们对我的能力充满信心,并愿意以朋友的姿态与我就本书所涵盖的许多话题进行辩论,这对我的帮助之大是他们想像不到的。

我还想感谢以下学者以往和现今的思维和他们对我的鼓励:安东尼·吉登斯、吉姆·麦克盖根、约翰·毕·汤普森和菲利浦·施莱辛格。在我的好朋友和好同事中,凯蒂·布鲁克、安克依·胡

格维特、沙让·麦克唐纳、戴岩·理查逊、莫里斯·鲁切和彼得·杰克逊是值得一提的。我还想特别感谢格拉斯哥大学媒介集团的丽兹·毕迪和古艾格·费娄对本书“卢旺达”一章的帮助。

最后,我要对我的朋友和家庭成员深深道谢,感谢他们在公认的烦恼时期中所寄予我的希望和支持,他们是:克里斯·贝伯、莉安·巴切勒、布赖恩·库默、克里斯·道克斯、盖伊·弗朗德斯、艾伦·弗朗斯、尤金·乔哥卡、简·史蒂夫·夏洛特、乔·赫德、科林·拉哥、兰恩·佩里·兰伯特、基蒂·堂娜·勒夫、亚历克斯·麦克唐纳、黑兹尔·梅、乔治亚·梅森、大卫·摩尔、莉安·欧德尔、贾迪什·帕特尔、尼古拉·派珀、保罗·兰塞姆、大卫·罗斯、博比·辛普森、威廉·丹尼斯、琼·史蒂文森、西蒙·昂格尔、罗布·昂温、埃尔希·韦伯斯特。如果没有你们,世界就显得小了。

本书的有些章节已经以不同形式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第二章曾以“媒介、伦理和道德”为题发表在1977年伦敦圣贤出版社出版的吉姆·麦克盖根版的《文化方法论》中。

第三章曾以“全球媒介和技术变革:社会公正、认知和日常生活公民身份研究的意义”发表在1997年《公民身份研究》1(3)期中。

第四章曾以“全球化、民族文化和文化公民身份”为题发表在1997年出版的《社会学季刊》总第38期上。

所有这些章节在本书中都以很不同的形式出现。第五、第六和第七章是第一次发表。

现在知道了
我所追求的
人生
是一个圆周
围绕着同情和理解
它在不停地扩展
我寻求的完整
是圆心加圆周
而不是
一个纯粹自我感觉的
排他的圆心
现在
处在圆心的奋斗已经结束
圆周正从四面八方
向我召唤

肯尼思·怀特 (1989)

译者说明

《媒介的转型——全球化、道德和伦理》一书翻译分工及译者姓名如下：

第一章之前、第一章	顾宜凡
第二章	顾宜凡 赵 晨
第三章	方 洁
第四章	林 喆
第五章	朱 童
第六章	王亦高
第七章	方 洁

目 录

第一章 前言	(1)
媒介:资本、国家和公众	(2)
当今媒介与文化研究	(7)
第二章 媒介、道德和现代性	(10)
公共领域:从再封建化到殖民化和司法主宰化	(13)
公共领域和道德进步	(20)
女权主义:主题及关怀伦理	(25)
威廉姆斯:交往和唯物主义伦理学	(30)
后现代中的哈贝马斯与威廉姆斯	(34)
后现代伦理、民主和媒介	(36)
第三章 全球媒介与技术变革:社会公正、认知及	
日常生活的意义	(42)
媒介与文化公民身份	(46)
社会公正与媒介	(47)
认知与媒介	(61)
意义性、日常生活与媒介	(67)
文化政治	(74)

第四章 文化公民身份	(76)
全球大同文化	(81)
民族公民身份	(88)
文化公民身份还是文化政策?	(96)
市民社会、价值与义务	(112)
文化公民身份:一种未来?	(120)
第五章 全球媒介文化:村落生活的轮廓还是	
文化帝国主义的支配?	(121)
对媒介帝国主义与文化帝国主义的重新思考	(123)
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与信息社会的全球流动	(135)
信息社会时代的全球媒介:速度文化与权力的	
空间维度	(146)
媒介全球化的矛盾	(169)
第六章 后殖民主义与媒介暴力:卢旺达,	
种族灭绝与全球媒介文化	(172)
英国国旗下的黑人	(180)
媒介、代表性与非洲	(183)
种族主义及其精神	(186)
种族灭绝与社会理论	(192)
卢旺达:社会与历史背景	(194)
小众媒介与种族灭绝	(197)
对种族灭绝的电视报道:卢旺达与国际媒介	(200)
暴力、民主与媒介	(212)
第七章 公共媒介文化的未来:批判与矛盾	(215)
人权、社会运动与全球媒介	(218)
技术文化、媒介与社群	(226)

卡斯特、媒介与批判理论	(233)
媒介与文化公民身份的简略议程	(238)
参考文献	(242)
译者说明	(252)

第一章 前言

20 世纪末的媒介变革,是发达工业社会以及全球社会目前面临的最重要的社会变革之一。正如本书将要阐明的,这些变革对我们共享的世界有着经济、政治和文化方面的影响。我们的文化被媒介化的程度,比起人类历史上存在过的任何文化被媒介化的程度都要深远。从对政治家的性生活的报道到对战争及饥荒的悲剧性后果的展现,媒介在伸展社区界限的同时,使我们接触到了与我们素昧平生的人们的生活。如果将我们现在“共同”的世界与 19 世纪末的世界相比较,那么我们可以指出的主要不同点之一,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大规模发展的公共传播系统。很难想像如果没有大众媒介,我们今天的生活会怎么样——人们将需要几个月而不是几秒钟才能得到世界各个角落的新闻,政客们将能逃过公众审视的摄像机,我们也没有可与朋友和家人去看电影的影院。大众媒介以它特定的形式,已经成了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当我们临近世纪末时,这些共享的传播网络正在进行着一种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的深刻程度就如当初电视的到来。新技术的出现(如数字电视、录像机、互联网等一大批其他形式)正在重新打造我们共享的文化景观。这种变革的真正重要性是什么呢?它必然会促成一个更具交流性的社会吗?这些元素对我们生活的时代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这类问题正是本书试图提出和讨论的。

媒介：资本、国家和公众

为了搞清 20 世纪塑造了媒介的构架和其话语,我们需要研究一下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公众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些概念之间的某一具体关联对某一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同,但找出其中的一般规律还是可能的。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这些相互重叠的元素决定了媒介文化的轮廓,它们还将继续对下一个世纪产生重要影响。然而,我们将在这本书中看到,全球化的进程和更“不确定”的政治参考框架,使得媒介的理论和实践更加复杂化了。

在 20 世纪,资本主义催生了基于标准化、商品化和一致化的大众文化。投资于媒介产业是为了获取利润,这与价值观无关。资本主义的大众文化随之建立在经过尝试和检验的系统秩序之上,这种系统对文化的创新和前卫的尝试极度怀疑。这一时期最主要的担忧是,支配性文化的制造者(比如美国)在消弱更有素养的品味的同时,也迫使非主流文化更加边缘化。不过,在近期的转型中,这方面的问题已经被提出。信息社会时代意味着广告、杂志和电视节目已经更加明确地按不同的生活方式分众化。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与大众一致性文化的联系正在消弱,而其产品更加迎合某些明确人群的喜好。电视节目、广告、杂志和电影的制作越来越多地考虑特定分众的文化构成。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一种现象,那就是,商业媒介文化更加迎合于那些全日制工作着的社会群体的需求,最近卫星和付费电视的发展就是一个例子。在英国,天空电视集团(Sky TV)对一些体育比赛,特别是超级足球联赛转播权的垄断,使能否观看足球比赛转播越来越取决于是否付得起费用。从有线电视和国际互联网的扩展,我们也可以看到,

在明显分众化的媒介文化之外,信息社会也正在技术富有和技术贫穷之间制造越来越大的鸿沟。这倒不是说大众文化已经被更加信息分化的文化所完全取代了。好莱坞正在把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视连续剧(如《复仇者》和《星际迷航》)搬上银幕,这就说明它仍在继续依赖以前形成的大众风格和品位。我的观点是与其说我们正在进入像波斯特(Poster, 1995)所称的第二媒介时代,不如说大众形式的文化仍然继续在市场细分和差异化的所谓后现代过程中发挥着作用。

自从出现印刷报刊以来,国家的概念在大众的想像中就一直带有相对的永久性。报刊和电视的发展在侧重点、所有权和控制方面也都一直具有特定的“国家”属性。许多电视节目、电影和报纸把一个公认的国家认同的概念当作理所当然的事,而客观上这些媒介本身也促成了这一概念的形成。在我们每天接触到的媒介中,绝大多数都或多或少的含有国家属性的“我们”。至于国家是公民意义上的国家,还是民族意义上的国家,大众传播媒介的内容便继续是一个粗略和现成的指南,因此,媒介文化在帮助界定社区界线时一直发挥着核心作用。然而,两个主要变化在此是可以区别的。第一,媒介越来越被大型跨国公司所拥有和控制,这些公司与某个特定国家的文化关联甚微。从在全球推销产品的意义上说,这些拥有差异化产品和庞大销售网络的大集团确实是全球性的机构,这就意味着支配传播的主要动力是市场而不再是国家。因此传播的未来,将取决于对资本的需求,而不是国家。第二,具有象征意义的产品和人越界进入其他国家,给国家文化带来了世界性的趋向。现代公民越来越习惯于生活在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组成的共享的文化氛围中,从中经常性地了解全球每个角落的情况。如果说传播媒介在本世纪初时还具有特定的国家性的话,那么,在世纪末,它则呈现出了混合化和全球化的趋向。不过,至今我的分

析与许多其他现有的论点相去甚远。我认为,虽然民族国家已经失去了相当多的权力,但它仍保持着影响力,社区的概念与国家地位的概念之间的联系绝不是或有或无的,国家仍然有塑造其公民社交身份的能力。我认为义务比权利更重要,我更强调国家与公民社会一般意义上的相互联系。

最后,与塑造商业文化和国家文化一样,媒介在塑造公共领域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如果商业文化关心的是经济交换,国家文化关心的是普遍的认同感和归属感,那么公众的概念则与民主意志的形成有着紧密联系的。它们不大依靠于体制决定的认同感,而更依赖于我们能够参与公众辩论的共同能力,这就不可避免地提出了一个带有道德和伦理性质的问题。换一句话说,当公众的概念与资本主义和国家共同成熟时,它们从理论上讲是分开的。公众的理念意味着媒介有义务提供那些使民族国家难堪的信息,揭露资本的滥用,允许多元化的社区以审慎的态度对日常的重要问题进行辩论。如果资本主义将人们看作是消费者,将国家看作是一个民族,那么公众的理念则将人们视为有着权利和责任的公民。带批判性的公众的理念使公民能意识到什么时候他们共同的文化是种族歧视的或性别歧视的文化,什么时候一些广为接受的观点是为强大的利益集团服务的,什么时候代表更广大社区利益的力量会阻断一些政治和科学界的行家们左右舆论的做法。虽然在上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公众可能对国家的概念习以为常,但今天已非如此了。公众领域是一个空间上被区分的概念,它作用在地方、国家和全球的不同层面,因此,有如生态问题的公共讨论就可以在学校杂志、全国性报纸和 CNN 新闻节目中同时展开。即时传播时代中的对话、讨论和民愤的媒介螺旋,呈现出它的暂时性和正式理性化的减弱。纷杂的媒介中也会出现像弹劾美国总统或种族灭绝这样真正的“全球性事件”,它扩展了人们固有的公众领域